

走读中国·盖洛人文地理丛书

沈弘 主编

中国长城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威廉·埃德加·盖洛 著

沈弘 恽文捷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走读中国·盖洛人文地理丛书

沈 弘 主编

中国长城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威廉·埃德加·盖洛 著

沈 弘 恽文捷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长城 / (美) 盖洛著; 沈弘, 恽文捷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8

(外国人看中国丛书)

ISBN 7-80713-187-X

I. 中... II. ①盖...②沈...③恽... III. 长城—
概况 IV. 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74621号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艾 菲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传真)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11 印张 142 幅图 19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原英文版出版提示

本书作者尽力避免赘言重述历史。书中插图不仅为充实文字，亦为资料之佐证。譬如，为替代对城墙各色风格之冗长枯燥、繁芜费力之描述，此处照片副本足以提供充足讯息而无须浪费铅字，因而应于阅读之中对书中插图加以仔细琢磨。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20 世纪初 W. E. 盖洛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系统考察

W. E. 盖洛 (William Edgar Geil) 是 20 世纪初在西方颇负盛名的美国旅行家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865 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顿城。1890 年从拉斐特学院毕业之后曾当过几年宣讲福音书的传道师。但在他心中一直蕴藏着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 于是在 1896 年, 他请了长假, 从纽约登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从此开始了他的全球旅行生涯。在此后 30 年中, 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非洲、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正如士兵战死于疆场, 学者辞世于书房, 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最终也是在一次重返圣城的旅程后病逝于威尼斯城。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中, 盖洛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3 年首次途经日本来到中国, 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 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 (包括云南、贵州地区) 的人文地理, 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4) 一书,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以后, 中国成了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 他又数次前来中国考察华夏神州, 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 连续出版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个省府》(1911) 和《中国五岳》(1926) 等一系列重量级的著作^①。

^① 在考察了长江流域之后, 盖洛曾经想溯黄河而上全程考察黄河流域, 终因黄河上游水道过于凶险无法通航而作罢。

在历史的长河中，写过中国的西方作家数以千计，我们为什么偏要挑中盖洛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独特价值。在其一生中，盖洛曾享有许多的头衔和美誉：首先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出版过13部著作，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演讲稿、报刊文章和信札。早在1905年，他就已被誉为“在世最伟大的旅行家”见识过了五大洲四大洋。他同时也被称做“伟大的演说家”，在世界各地作过几千场演说，听众达数百万之多。在其传记中，作者总是称他为大字书写的“探险家”（the Explorer）。丁韪良在为《中国十八个省府》所撰写的序言中，也将这位探访过非洲原始森林和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的探险家跟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相提并论。然而，盖洛有关中国的那四本书中最吸引我们的并非是那些华丽雄辩的文字，或是吊人胃口的历险故事情节，而是作者用照片、文字、图片、地图、谚语等一系列手段详细记录的20世纪初中国精确真实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和现状。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士，盖洛所选择考察中国的角度是独特和具有前瞻性的。他是早期系统考察长江流域人文地理的少数西方人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中国十八行省首府和五大名山的人文地理学家。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发现国内外曾经有过如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传统和现代人文地理的第二人。他在考察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各地的方志和当时已有的科技手段包括摄影技术等，仅上述四本书中他就附录了精选的四百多幅照片作为插图，其中包括了长城所有烽火台和1909年中国18个省府的历史照片。这些老照片，已成为研究中国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的无价之宝。

由西方人来写中国，其难度可想而知。在1842年中国的门户被迫对西方开放之前，能够进入内地的外国人可谓凤毛麟角。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与民族之间方言繁杂，况且当时盗匪出没，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即使在门户开放之后，西方人要真正能够做到周游神州大地，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些还不能算是阻碍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真正障碍。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西方人相去甚远，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东西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要想打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又谈何容易！故而，在盖洛之前虽然也有相当数量有关中国的游记和论著问世，但是真正能够准确把握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客观反映神州大地人文地理全貌的著作可谓屈指可数。绝大部分作者往往受到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局限，要么钻到故纸堆里，靠第二手材料来编织这个东方古国的神话；要么凭借自己对中国浮光掠影的印象和即兴的想象发挥，来描述一个不甚准确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形象，颇有点坐井观天的意味。例如，任职为奇齐克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的英国植物学家福均（Robert Fortune）自1843年起曾四次来华调查中国茶叶的生产、栽培和制作的情况，并先后出版了至少五部有关中国的游记。其中第一部书名为《华北诸省漫记》，可是茶叶怎么会跟华北诸省有关呢？假如你有兴致耐心读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儿所说的“华北诸省”原来不是指河南、河北或山东、山西，而是指江苏、浙江和福建等产茶的省份。

早在19世纪初，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就已经发现，在有关中国的早期论著中所描述的

情况和他所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和距离。在其于1832年创刊并主编的《中国丛刊》首期发刊词中，他就大声疾呼，要以该刊物为平台，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裨治文认为，关键是要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的田野调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西方作者应给予中文典籍和方志以足够的重视，因为那里面包含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实证的精神，对中国的地理、气候、矿产、农业、渔业、商业、宗教和社会结构等做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无论多么微小的细节都不能忽视，都要认真加以记录，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西方人准确地了解这个古老帝国的状态和特点。

虽然盖洛与裨治文的年龄相差半个世纪，但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新英格兰新教背景 and 美国人典型的实证精神。在撰写其四部有关中国的论著期间，盖洛不仅大量收集和（借助翻译）阅读中文的典籍和方志，而且矢志不渝地坚持在描述某一地方或事物时必须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原则。即使是在回顾历史事件时，也尽量设法借助摄影技术和历史图片、地图和拓片等手段，帮助读者回到事件现场。在考察长江流域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语言不通、不得不借助当地苦力和向导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深入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写《中国长城》时，他带着一支精干的考察队，从山海关一口气走到了西藏境内，沿途采风，记录下了有关长城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原本大家都以为长城的最西端为嘉峪关，但盖洛在实地考察时却发现在嘉峪关以西的西宁或西藏境内，仍然有连绵不断的城墙向西延续，而这些残存的城墙当时的地图上并未加上标明，就连西宁的地方志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①在考察了长城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中国18个行省的首府和京

^① 在该书中，作者附了两张记录这段长城的照片。

师，每到一处，必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文人学者（为此目的，他专门在上海定制了200张中国式样的名片），收集典籍方志，参观名胜古迹，采集民风民情。他为最后一本书来华实地考察时已经54岁，身体也比较虚弱，然而他仍然在妻子的陪伴下，坚持一座又一座地攀登了中国的五大名山，亲自考察当地的民俗和道教信仰，并用相机记录下了有关历史。这种为追求理想而不惜“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坚毅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盖洛这四本书中所包含的近五百张老照片、图片、拓片和地图^①加在一起，展现了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时期中国文化、民俗、社会各界人物和地理风景的独特历史画面。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这些老照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时代感。照片的内容包括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每一个行省首府（包括京师）和众多其他城镇及乡村的建筑，包括街道、城墙、城门、庙宇、农舍、贡院、学校、官府、衙门，以及小桥流水、江河湖海、名山大川、悬崖峭壁、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滩等自然景色。除了总督、巡抚、外国传教士、社会名流、钱庄老板、少数民族之外，就连街头的小吃摊、茶馆、店铺、鸦片馆、剃头挑子、小贩、工匠、乞丐、苦力、独轮车夫、江湖郎中、朝圣香客、算命先生、妓女、赌博摊子、花轿、婚葬行列，以及衙门里的公堂提审、寺庙里的和尚道士、乡间的水车和放牛娃也都进入了盖洛的镜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如今这些画面许多东西都已不复存在了，因此它们成为历史的最后见证。例如，盖洛在考

①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in Pigmy Land*, 1904）中有119张，《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 1909）中有116张，《中国十八个省府》（*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 1911）中有139张，《中国五岳》（*The Sacred 5 of China*, 1926）中有104张，共计478张，这还没有包括第三部书中解释汉字寓意的插图，如加上那些插图，总数就很接近500张了。

察长城时，把当时尚存的每一座烽火台都编上号，并拍下了照片。其中有些镜头在无论中文或是西文的其他资料中都已绝迹。再举杭州为例，从19世纪末洋人绘制的地图上看，当时杭州城的城墙和10个城门、4个水门还首尾相连，相当的完整。可如今除了一个水门的局部尚存，以及武林门、凤山门、涌金门、清波门等地名还在使用之外，清末那些城墙和城楼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中文资料中，我们最多只能找到描述这些城墙、城门的片言只语，但在《中国十八个省府》一书中，我们却惊喜地发现了杭州凤山门、御街和大运河上的太平桥等早已消失的历史陈迹的老照片^①，它们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还原了20世纪初清末老杭州的本来面貌。盖洛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该书的百多张照片是从12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盖洛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总数应该在5000张以上。

在历次考察过程中，尤其是在1909年访问中国18个省府时，盖洛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因为他身边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

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里瞧不起那些动辄便要撒野的赳赳武夫。无论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屈从于西方人的见解，并已经训练出大批的士兵。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包括了许多类似于西点军校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武备学堂。在每个大城市里都建起了兵营，而且往往是兵营刚刚落成，马上就住满了士兵。再也见不到弓和箭，也没有了翻跟斗和嚎叫，取而代之的是用欧洲的精确定武器所进行的系统

^① 盖洛在《中国十八个省府》(*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 1911)中附了杭州的9张老照片。

性欧洲式操练。……整个大清帝国都在武装起来，其方式并非是心急火燎的，而是非常彻底和执着的；中国的资源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能比拟的。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武备学堂和兵营。一路上，盖洛见到旧的贡院被拆毁，其废墟上建起了西式的学校和大学；公共图书馆和邮局取代了旧式的藏书楼和驿站；铁路正在替代大运河作为交通干线；工厂和煤矿在全国各地出现；纸币正在开始淘汰已经用了上千年的铜钱；学生们在谈论革命、民主、自尊、公民权和改革；就连巡抚和省府衙门都在筹备议会的召开。盖洛敏锐地意识到他必须要用相机把这些历史变革的瞬间定格在他的照片之中，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和有预见性的事实”，而“事实毕竟胜于雄辩”，“事实摆在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对此加以阐释”。就这样，我们通过这位“扬基佬”的相机镜头，看到了用宝塔替代钟楼，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看到了在泰山庙宇前从相机镜头前抽身逃走的尼姑；看到了不久以后便绝迹的开封中国犹太家庭。如今，盖洛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些貌似随意的快照现已成为难能可贵的文化珍品，而它们记录的历史瞬间如今已变成了永恒。

虽然偶尔盖洛把个别地图放错了地方，但他所收集的地图都分别是当时最佳或最新版本的，其价值不言而喻。例如他所选的广州历史地图取自《羊城古钞》，而他选中的成都地图则是宣统元年三月绘制的《最新成都街市图》。其中有些地图甚至是盖洛的传教士朋友亲手绘制的，例如英国医师祝康宁（F.H. Judd）绘制的江西北部地图和莫泽（I.H. Moser）绘制的汉口地图。

上述这些插图在书中并非仅仅起点缀作用，而是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在上述图书出版之际就受到了评论家的

赞誉和读者的欢迎。盖洛曾经宣称：“这些插图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不需要多余的文字说明。”出版者也以同样的口吻来解释这些插图的意图和功能：作者试图避免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书中的插图不仅仅是为了充实文字，而且是为了对文字做一些实质性的补充。作者与出版者的上述努力没有白费，从为《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作广告而汇集的报刊书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书中的这些插图评价很高：“该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精美的插图”；“插图印得非常漂亮”；“插图精美，引人入胜，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价值”。

二

盖洛是一位狂热的藏书家。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一处当他拜谒当地的督抚和文人学者时，必定会要求对方提供有关当地的古史、方志、地图和碑文古迹等信息。在《中国十八个省府》一书序言中，盖洛对他这样做的动机做了如下解释：

当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们携带着古希腊的学问逃到西方时，没过几年以后，那些古老而受到敬仰的拉丁语教科书便被当作废纸从欧洲的大学里扔了出来。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么一个时刻。在过去两千年中被用来训练中国文人的那些典籍和更为短命的那些通俗小说和志怪杂记同样即将寿终正寝。西方的学问和垃圾正在将原来的那些书籍取代。过不了多少年，那些老的书就会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官方的毁书行动已经开始。在总督、巡抚、翰林学者、藏书家和书商的帮助下，我们收集到了一大批这样的老书，并在本书中选用了其中的少数范例，以便使读者能了解这些古书的风格。

丁韪良在其序言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并且预言：“这些浩瀚的文献必将成为一个汉学研究图书馆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盖洛为收集地方志所做出的努力。在上述一书出版以后，盖洛又再接再厉，开始为他的下一本书《中国的五岳》收集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盖洛不得不两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然而这个期间他在研究中国的典籍上则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他的传记作家威尔逊告诉我们，盖洛于1916年12月30日写信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惠志德博士(Dr. Wherry)，向他索要描写五大名山的地方志。后来在《中国五岳》一书中，盖洛果然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泰安府志》等各种中文典籍中引用了大量的图片、地图和文字资料。为此，他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①的高度赞誉：

我认为，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引自中文典籍的译文。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件包括了诏令、序言、日记、传记等，这些材料以前从未见诸任何其他出版物，其中有些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们对于学者非常珍贵，普通读者对此也会颇有兴趣。显然完成这本书需要有极其繁重的工作量和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它是你所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我们完全赞同翟林奈这个颇为专业的评论，盖洛对于中文地方志的重视和研究在西方作家中确实比较少见，这也是他的著作具有学术价值的一个突出特征。

^①翟林奈是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思(H. A. Giles)的二儿子，出生于中国，后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负责管理东方书籍。

中文地方志为盖洛提供了有关各地区的社会历史、地理构造和文化习俗的大量细微而翔实的信息。在《中国十八个省府》一书中，他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来描述了长沙的自然地理和城池建设、成都的物产、北京的政治史、杭州名称的演变、广州的人物传记、太原的轶事传说、安庆的地方诗歌、西安的家庭礼仪、济南的赋税制度、南昌的灾祸和迷信，等等。

盖洛在该书中对地方志中的“祥异”即超自然现象，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他所引用这部分内容的频率仅次于政治史。在这些超自然现象中，有一部分是像彗星、地震和气象等使古代人感到困惑，但却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自然现象。这些记载，由于有确切的日期，对于科学家和学者来说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然而其他大部分的“祥异”内容却都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这些材料若在人类学家手中，可能会给《金枝》一类的书增添不少素材，然而盖洛选择这些材料却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迷信。他把“风水”和“祥异”归类为“迷信和偏见”，并且宣称：“迷信和偏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毒药”。他的这种说法可谓一针见血。迷信和偏见的对立面，按照盖洛的观点，是科学和信仰，当然这里的信仰他指的是基督教信仰。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盖洛对于迷信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又跟西方在华传教事业存在一定的联系。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其研究和考察的深入，盖洛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越来越着迷。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中，盖洛跟其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旅游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能吸引他的仍是些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人物和风景画面，但他在旅行过程中逐步了解并热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文学、生活习俗和民间传说。等他在写后面这几本书时，盖洛已经越来越自觉地把对于这片国土的客观描述跟在这儿生活的人民，以及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传说

故事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十八个省府》中，盖洛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对地方志感兴趣，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他洞察中国人的心态：“说真的，对于事件的简洁记载偶尔也使人感到失望，但从中可以窥见人民的感觉，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和伦理概念都通过这些记载表露无疑。”盖洛与其他旅行家和游记作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兴趣和探索。他为此在智力和体力上付出的巨大努力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人文地理学家。

盖洛在书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这两个范畴。盖洛不仅想抓住现在的瞬间，而且也努力挖掘深层的历史，这样就能在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上凸显出处于往昔和预见未来转折点上的中国社会的状况。他在《中国十八个省府》一书序言中指出：

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再次重复同样的旅行，因此我们并不想把此书写成一本旅行指南。然而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各种事物的不断变化，并试图对此现状做一个印象主义的描述。而且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记录这产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中的一年，而使这本书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从而能跟我们研究中国的其他著作一起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所收藏。

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媒介，盖洛成功地记录了20世纪初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上述这几本书现在确实已经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所收藏。

作为西方现代科学和实用主义的鼓吹者，盖洛在阐释中国文化时，往往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例如他对于古代中国人建桥的工程技艺推崇不已。他所拍摄的老照片中有许多是表现石拱桥和悬索桥的，如贵阳的大南桥、杭州的太平桥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相当

普遍的的悬索桥等。他在提及跟成都有关的诸葛亮、李白和李冰这三位名人时，认为其中最伟大的应是水利专家李冰，因为他所建造的都江堰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好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诸葛亮和李白的知名度可能要比李冰高得多，因为后者作为工匠艺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向来很低。盖洛出人意料的观点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推崇中国科学家的西方人，即著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们所提供的新视角可以帮助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其历次在中国的旅行和实地考察中，盖洛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上面已经提及他在西宁和西藏境内发现的长城环线，这个发现使得西方的中国地图上又增添了长达两百英里的长城。他还收集、请人翻译并引用了大量的碑文拓片。许多这样的石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或是因为石头的风化，或是由于人为的毁坏。如今我们只能通过盖洛保存的碑文照片来了解这些碑文的内容。虽然盖洛自己并不具备翻译这些碑文的能力，但他扮演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者、收藏者、编纂者、保存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在保护人类文明这个方面，他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使得美国这个国家能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

三

除了对老照片和地方志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之外，盖洛对于中国的谚语和通俗文学也情有独钟。他在中国旅行和考察的过程中总共收集了数千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谚语，因为他认为这些民间的口头禅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往往能够直观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伦理概念和心态。作为演说家和作者，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在演讲和写